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耀千秋的西北军工文化

喇叭吹，锣鼓敲，扭秧歌，踩高跷。这是陕北和晋西北临县等地流行多年的传统民间艺术，锣鼓则是陕北和晋西北普遍适用的民间打击乐器。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锣鼓则不同凡响，它们是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军工文娱宣传使用过的乐器，见证了当年西北军工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和以吕梁为中心的晋绥根据地生产战斗中创造的多彩军工文化。



铜铲、铜锣、鼓(馆藏文物)

军民合力开展文娱宣传

由于军工生产工作紧张，生活艰苦，搞好文化娱乐，减轻工作压力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因此形成了特色鲜明、绚丽多彩的兵工文化。当时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发动群众，自编自演一些节目。如山西梆子、京剧、道情等，根据情况组织活动。每年大型节日活动，如元旦、春节、五一、七一、八一等节假日，都有较大的演出活动，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搞得更加热闹，厂里除了唱戏外，有秧歌剧、踩高跷、龙灯、旱船等。农民们敲锣打鼓，抬着杀好的猪羊慰问工厂的职工。晋绥兵工部第四厂政治指导员兼党总支书记康琳带头唱歌演戏，在她带领下，职工群众对扭秧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新年演出了“张老汉劳军”“夫

妻拜年”“卖布”“七枝花”等节目，丰富了兵工厂文化娱乐活动。

西北兵工三厂聘请了有文艺专长的职工组成了两个戏班子，一个是以田福成为首，演唱晋剧；一个是以韩茂德为首，演唱京剧。这两个戏班子各有千秋。通过组织了一些有“文艺细胞”的爱好者，参加业余培训，以组织者为导向，兼老师采取边学习、边排练的方法，不几个月就粉墨登场了。这一下轰动了全厂和当地的老乡，演出效果很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晋剧上演的节目有“打金枝”“金水桥”等，尤其是晋剧适合当地的民风习俗，深受广大职工和老乡的喜爱，周围老乡只要听说工厂演戏，就从几十里外

赶来。京剧上演的节目有“法门寺”“打渔杀家”等，也倍受群众欢迎。当时演出“法门寺”这个剧目，主要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精神，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打渔杀家”主要反映杀富济贫的思想，演员对“打渔杀家”还进行创新，比如，把贪官吕子秋进一步丑化，他的上场台词是“做官、做官、鼻梁上有块豆腐干”，以表示对贪官的讥讽，在演出中受到了好评。

每逢节假日或庆祝活动，都要演出。演出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三查运动和土改运动，使广大军民既受了教育，又密切了军民关系。

当时，晋剧业余演员有田福成、魏毅芳、任存柱等，京剧业余演员有韩茂德、张作鹏、宁长海等，歌剧业余演员有席道修、李培刚、李德兆等。他们用文艺形式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教育鼓舞了兵工战士和广大群众。

生活。茶坊兵工厂文化教员韩川(即张汉川)连夜写出歌词，经塞克同志修改，冼星海同志谱曲创作的《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厂歌》，成为根据地人民、兵工厂工人都喜欢的歌曲。歌词如下：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工厂。为抗战工作，站在国防生产的岗位上。同志们！凭着比钢铁还强壮的臂膀，建立起重工业的基础，充实起我们的国防。多一份劳动，多一份力量。多一部机器，多一个抗战的武装。同志们！凭着比钢铁还强壮的臂膀，建立起新中国的基础，充实起我们的国防。

这首厂歌，反映了兵工工人的历史使命，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在那抗日烽火年代里，延安兵工厂的同志们都喜欢唱自己的歌。日后流传到太行山等革命根据地，成为广大兵工工人都喜爱的歌曲。

职工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由工会文体干事组织职工打篮球、下象棋，在节假日还组织青年工人开展踩高跷、扭秧歌、唱戏、耍魔术等娱乐活动。丰富的兵工文化生活，使大家虽然在大山沟里，一住就是七八年之久，但大家的精神仍很饱满，对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和鼓舞激发士气干劲起了很好的作用。

西北军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升华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发展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人民兵工精神，是一笔重要精神财富，至今仍是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传家宝”。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

《抗战日报》创刊后，面临的是极为残酷的战争环境。在创刊的第一个年头，就赶上日军反复开展大规模扫荡，加之国民党的多次军事围剿。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报社工作人员不得不“游击办报”。创刊不久，报社就数度转移，后来在河西岸神府县前杨家沟村建立了后方基地。在战斗紧张激烈的时候，为了保证报纸按时出版，编辑人员就渡过黄河在神府安营扎寨，战斗结束后再返回河东，就这样，以黄河为屏障，报社人员穿梭于黄河两岸，在黄河两岸游击办报。

每次转移渡河，报社人员都要经历一番辛苦。那时一遇日寇扫荡，就“坚壁清野”，报社人员把桌椅板凳藏进山洞，背上单薄的行装，挎上文具包和干粮袋，向黄河对面的安全地方转移。特别在冬季的反扫荡转移时，晋西北黄河两岸农村，一出门就是山，黄土高原的西北风，往往扑面而来，而河面上早已结冰，转移的工作人员脚下打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有时冰层裂陷，掉进水中，双脚冻得麻木，不少人手脚患上冻疮。到了河对岸，没有煤炭和木炭取暖，只好七八个人挤在冷炕上和衣而睡，没有桌凳，墨水冻结，只得趴在房东的炕头写稿编报。据在《抗战日报》工作过的同志们回忆：“编辑同志们夜间睡在冰冷的炕上，人人缩成一团，这是最难挨的，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工作紧张劳累，有些同志积劳成疾，第一任总编辑、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赵石宾同志就是在日夜操劳、缺吃少药的环境下，在1942年3月30日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年仅二十八岁。”

生活环境艰苦，采访环境更为艰苦。深入前线和基层采访的报社记者，他们随军采访，往往黄昏开始行军，途中不得吃饭，不能休息，黎明到达宿营地后又要抓紧采访写稿。在游击区采访和遭遇敌人时，他们或者参加战斗，或者巧妙地躲过敌人，然后继续进行采访。采访完后，他们再返回驻地，顾不上休息，有的装好手摇马达和收报机，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有的修改手头的稿件，有的撰写评论文章，一片繁忙景象。当时的许多期报纸，就是这样在战斗中编排出来，与读者见面的。

报社的发展与影响

尽管面临着战争与饥饿的威胁，但报社人员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使得《抗战日报》渡过初创阶段的难关，在晋西北大地站稳了脚跟。随着形势的发展，1946年7月1日，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抗战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从创刊到1949年5月1日终刊，报纸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时将近9年，共出版2171期。在这期间，先后有606名编辑、记者、报务人员、印刷工人以及出版发行人员在报社工作，他们在战火年代为办好这张报纸浴血奋斗、忘我献身，使《晋绥日报》从最初的每期2000余份增至后来的15000份，在晋绥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号角”“抗日旗帜”和“反映人民的一面镜子”。

发展与壮大：在战斗中砥砺前行

晋绥日报社：艰苦岁月里的新闻坚守与时代担当之一

□ 袁志钊

军工之歌唱响秦晋大地

军工之歌为代表的军工文化是西北军工的重要精神财富。当时在西北军工中到处传唱嘹亮的歌声，“我们有兵工厂，打起仗来有力量；我们有毛主席，反动派必定要灭亡；我们靠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四面八方；我们靠毛泽东思想，工农联盟有力量；我们靠毛泽东思想，制造枪炮打蒋帮；我们靠毛泽东思想，反动派必定灭亡。”

军工厂工人经常利用夜校上课前唱革命歌曲。当时，职工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有《工人战歌》：我们工人有力量，白天黑夜工作忙；拿起枪来打鬼子，开动机器造刀枪；《反“扫荡”之歌》：鬼子来了我上

山，鬼子溜走我回厂，挖出机器造枪炮，狠狠打击小东洋，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强，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壮大；《掀起生产高潮》：响应党的号召，掀起生产高潮，努力生产造枪炮，造枪炮！打败鬼子尽忠孝！响应党的号召，掀起生产高潮，家中的事父母来照料，来照料！打败鬼子尽忠孝；《陕甘宁兵工厂厂歌》：制造千支万支枪，送给前线的英雄。制造千颗万颗炸弹，对准日本鬼子轰。努力啊！弟兄们！我们是自由的兵工，我们要做国防建设的先锋，我们要做国防建设的先锋。

特别是1938年，冼星海、塞克同志由鲁迅艺术学院到陕北茶坊兵工厂体验

能者为师传承兵工精神

为了适应军工生产的需要，晋绥军工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每周上文化教育课。不论文化高低，能者为师，凡有点文化的，就要担任讲课任务。当时采取文化课上政治，政治课中学文化的办法，既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又学习了文化，一举两得，颇受群众欢迎。为了解决生产技术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就请有关同志讲技术知识，由延安来的姜怀工程师讲关于枪炮原理，化学由黄沙讲，生产实际操作由

吴奎龙、田培闵、刘国成等讲授，手榴弹、炸药、拉火、雷求等由皮德山讲解。不拘一格，谁懂什么就讲什么，经过技术教育，促进了大家学习技术的热情，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事故大大减少，也丰富了工人的文化生活。

当时，在文娱宣传中经常需要背台词。为了熟读台词，许多职工群众自觉学习识字，用当地民间文艺“莲花落”(一种民间说唱文艺)来反映工厂的生活、学习、生产、工作。后来，晋绥兵工部第四厂政治指导员兼党总支书记康琳提出了组织职工练习写通讯及剧本的小组，报道工厂活动，推动文娱工作进一步开展。在丰富

